

日本在華輿論對清末教育改革的觀察 ——以《順天時報》的「論說」為中心

周東怡*

摘要

日本在甲午戰後積極地協助清朝進行各方面改革，並提供自己的「西方經驗」。然而日本對清朝提供的利用「西方經驗」的「日本模式」，應不僅限於制度架構，更有思想層面的移植。而想要釐清這個課題，可以從幾個清末中國對日本資訊的來源，以及日本可以向中國發聲的管道著手。除了已多為研究者所注目的清末赴日視察者留下的日記與紀錄，以及日本明治時期所發行的教育雜誌之外，另一個日本可以對晚清進行改革經驗傳承的媒體，即為在華的日系機關報。因此本文以後者為主，選擇《順天時報》中的「論說」與清末教育改革相關論述為討論對象。從（一）對清末教育改革與訂立制度的綜合性建議、（二）討論尊孔的意義與日本之關聯、（三）闡述精神與道德教育重要性的論述、（四）有關科舉廢止與後續配套措施的提案、（五）關於女子教育的看法、（六）對小學教育修訂的議論等六個方面，來看日本在華輿論對當時清朝教育改革的想法，以釐清晚清教育改革中的中日關係的另一個側面。

關鍵詞：《順天時報》、教育、日本模式、輿論、晚清中日關係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一、前言

日本的中國教育史學者阿部洋曾指出，清末最後十年間所進行的制定近代學制、建立各級學堂體系，並且以全國性的規模廣設新式學校並普及教育的一連串措施，是全面性模仿日本明治維新後近代教育的制度、目的、內容、方法，就此意義而言，清末教育改革可謂是「日本模式」的改革；¹特別是《奏定學堂章程》的內容看不到任何參考日本以外國家的教育制度。²他以「日本模式」這個概念為主軸，從自強運動時期開始，注意到晚清近代學校的發軔，再討論戊戌變法時期，康、梁透過時人著作與傳教士的翻譯，吸收已於明治日本頒行的近代教育制度，並首次將之運用到戊戌變法中教育改革相關政策，最後到由清政府主導的庚子後新政，透過訪日教育調查與大量翻譯日本出版的教科書為準備，正式將新政制定的教育政策與走向，確立為「日本型」教育制度。³清末教育改革可謂是「日本模式」的改革此一概念之創始，實始自阿部洋。其後，學界討論晚清中日間的教育文化交流課題的著作，也多沿襲並繼承此概念。⁴然而，阿部洋所提出的這個「日本模式」的改革，主要偏重在制度層面的移植與影響，並未深入探討這些近代教育制度在日本制定的背景、制度內容於近代教育中所蘊含的意義。⁵

¹ 阿部洋，《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東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0），頁14。阿部洋在本書中從（1）清末教育改革可謂是「日本模式」的改革、（2）中國人的留學日本、（3）僱用日本人教習此三個面向，討論晚清中日間的教育文化交流問題。

² 阿部洋，《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頁35。

³ 阿部洋，《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頁14-51。

⁴ 例如汪婉便指出，晚清中國的近代教育制度即為「日本型教育制度」，而「日本型教育制度」之所以能成立，取決於晚清中國注意到日本在明治時期急速的近代化成功，並成功的取得近代化（或是西化）與傳統文化接軌時的平衡。參見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頁366-371。

⁵ 其後該氏在討論晚清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議題時，也將關注的視角轉向近代化教育制度如何滲透到地方的過程，以及一般民眾面對新制度實施時的反應等等面向，未再針對「日本模式」的改革進行制度層面以外的探討。參見阿部洋，《中

日本在甲午戰後積極地根據「清國保全論」，協助清朝進行各方面改革，並提供日本自19世紀中葉幕末開國至明治新政府建立以來，是如何急速近代化，並培養出能接受西式近代制度，且具備理解國家統整所需之國家和國民意識的國民，以及良好接續傳統文化和西方近代制度思想的「西方經驗」。因此，日本對清朝所提供所謂「日本模式」的改革，應不僅限於制度架構的模仿再造，更應具有思想層面的傳遞和移植。

為釐清這個課題，可以從幾個清末中國吸收日本資訊的來源，以及日本可以向中國發聲和宣傳的管道著手。例如清末赴日視察者留下的日記與紀錄中，隨處可見清的朝野人士向當時日本政府官員或是學者請益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經驗，並討論適用於清朝現況的改革方式之相關內容。另外，於日本明治（1868-1912）時期所發行的組織會刊或教育系雜誌中，經常刊登文章鼓吹倡導日本應協助甲午戰後的清朝推動改革，並力倡日本應發揮積極作用；以及針對清朝的各項改革措施，尤其是教育方面提供具體建議和系統性政策。前者的視察者的日記和紀錄在當下並不輕易公開或流通市面，並非是面向大眾的讀物；而後者的日本明治時期雜誌雖然會定期出刊，但因其發行地在日本，清朝朝野人士較不易直接取得，所以面臨與前者相同的問題點，意即這些傳遞途徑的受眾者在先天上有所限制。⁶

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過程》（東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3），頁i-ii。

⁶ 另外，也有不是由日本方面主動提供資訊或是出版的刊物。最為著名的是清末流亡日本的知識分子與留日學生等群體所主辦之出版品，約略與《順天時報》同時期，在日本橫濱由梁啟超等維新派人士主導發行的《新民叢報》（1902-1907），為半月刊雜誌形式。除了與《民報》在針對革命共和與保皇立憲等，對清末當時的政治改革方向的相關爭論之外，以日本的漢字翻譯，介紹與引介西方新詞彙；或是援用西方與日本的思想資源，重新為中國提供建設「國家」時所需的新概念與形塑之路，《新民叢報》都發揮了借鏡日本改革時對西方的吸收與轉化，再將之轉介、再選擇與再脈絡化的作用。參見：朱浚源，〈清末新民叢報、東方雜誌和民報對立線的意見（上）〉，《食貨月刊》13：7、8（臺北，1983.11），頁302-318；朱浚源，〈清末新民叢報、東方雜誌和民報對立線的意見（下）〉，《食貨月刊》，13：9、10（臺北，1984.1），頁424-442；鄭文惠、邱偉雲，〈從「概

然而報紙則不然。有別於傳統書籍，報紙作為傳遞知識和資訊的新興媒介，具有機器印刷、定期出版，以及面向大眾發行的特點。機器印刷可以增加出版速度並降低成本，也因此能夠大量且定期發刊，同時配合交通運輸網絡的發展，建立銷售據點，使流通更為快速。⁷加以報紙刊載的內容，具有即時性和時效性，多討論當代的現實問題和思想，⁸因此，在華的日系機關報實為一個理解日本以主動立場角色，對清傳遞和提供改革思想與建議的重要對象。本文擬以清末在北京創刊，發行期間長達三十多年的《順天時報》的「論說」為中心，以其中與清末教育改革相關論述為討論對象。

二、《順天時報》及其「論說」的特色

（一）《順天時報》的創辦背景

中國現代報紙的誕生，多出自外國人之手，自清朝中葉後便開始陸續在中國境內發行。其種類除月刊、周刊、日刊之外，還可依語言分為中文報紙與外文報紙。發行地點則包括原本就與外國人有較多接觸的地區，如廣州、澳門、香港、廈門、天津、北京、漢口、青島、福州、大連、長春、吉林、哈爾濱等地，以及通商口岸和租界地區。⁹

根據研究統計，直至民國成立為止，外國人在華創辦的報紙多達142種，其中包括外文報紙124種、中文報紙18種。而由日本人所創刊的報紙，大多出現於甲午戰爭前後時期，雖然相較於其他在華創辦報紙的國家起步較晚，但發展卻相當迅速。到民國成

念」到「概念群」：《新民叢報》「國家」與「教育」觀念的互動與型塑》，《東亞觀念史集刊》，10（臺北，2016.6），頁37-102；韓承樺，〈複合式語言及難解的棋局：晚清時際的「群」／「群學」和「社會」／「社會學」〉，《東亞觀念史集刊》，13（臺北，2017.12），頁341-393。

⁷ 褚金勇，《從書籍到報刊：晚清文人的書寫轉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頁14-29。

⁸ 褚金勇，《從書籍到報刊：晚清文人的書寫轉型研究》，頁54-59。

⁹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4），頁52-78。

立前夕，日本人在中國創辦的報紙，合計共有日文25種、中文12種，以及英文2種，特別是其所創辦的中文報紙數量為其他各國之首。¹⁰

日本在甲午戰後基於對中國合作提攜，以擴張在華利益與培養親日勢力之方針，除了歡迎中國朝野派遣視察者赴日參觀視察各項近代化設施與制度、還積極鼓吹中國學生赴日留學、並在華開辦學校，中國境內創辦報刊亦是在此政治背景下進行。而在日本人於中國所創辦的報刊中，最受矚目且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在北京創刊，發行期間長達約三十年的《順天時報》。

《順天時報》自1901年開始發行，到1930年正式停刊，是一份在北京由日本人經營發行的中文報紙，也是在北京第一份由外國人所創辦的報紙。該報的發行期間正值義和團事變後到九一八事變前夕，可謂二十世紀初期，近代中國歷史最激烈變動的時期；加以發行地北京為當時中國的政治中心，因此該報紙及其內容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都對同時期中國具有一定的影響力，¹¹其開創性與重要性亦不言而喻。

該報創辦人為中島真雄（1859-1943），曾經擔任東亞同文會福州支部長一職。他趁著慈禧太后（1835-1908）與光緒皇帝（1871-1908，1875-1908在位）因八國聯軍之役避難西安的時機，於1901年12月，在原本不允許外國人辦報紙雜誌的北京創刊發行《順天時報》。¹²由於東亞同文會在成立未久之際，便制定了保全中國、扶助中國及朝鮮的改革、研究中國時事、喚起社會輿論等四項對華綱領與其他具體政策，¹³因而，許多研究都認為《順天時報》是東

¹⁰ 吳文星，〈順天時報——日本在華宣傳機構研究之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6（臺北，1978.5），頁389-390。戈公振，《中國報學史》，頁62-64。

¹¹ 例如楊早便認為，《順天時報》在北京的經營至1916、1917年時達到巔峰，在北京市民的公共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接近日本國內的新型報業。楊早，〈順天時報的崛起——1916～1917北京輿論狀況〉，《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4：5（佛山：2006.9），頁43-48。

¹² 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上）》（東京：原書房，1968），頁717。

¹³ 〈會報〉，《東亞時論》，1（東京，1899.12），頁121。

亞同文會對華事業的一部分。¹⁴事實上，《順天時報》也的確與東亞同文會系的《同文滬報》（上海）、《漢報》（漢口）、《閩報》（福州）等有所關聯。

1905 年起，中島真雄將《順天時報》轉讓給日本外務省（駐華公使館）管理，該報開始與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產生緊密的聯繫。其後經歷了辛亥革命、袁世凱政府、北洋政權，和國民黨北伐等政治變動，直至 1930 年 3 月，由於當時日本內閣的財政緊縮政策與放寬對華政策，外務省才正式停止發行該報。

《順天時報》在創刊初期，以東亞同文會的「清國保全論」為準則，向中國介紹日本的近代化制度，並呼籲中國應學習日本的政策舉措以進行改革。該報發刊詞便表示：「中國國土遼闊、人民眾多、資源豐富、雄視宇內，但今日失其主權，須改弦更張力圖進步，此為時報創刊之目的」。¹⁵明確表示其主要旨趣，為希望中國能順應世界大勢以及時代潮流，得以進步與發展，並期望促進中日相互提攜以生存於世界。加以當時在中國，報紙多為外人所經營並享有治外法權，言論相對自由，內容也較無限制，由於讀者群眾頗多，亦甚受當時中國部分官僚與知識份子的歡迎。¹⁶

然而也有相關研究指出，甲午戰後日本在華創辦報刊之目的，不外乎提供中國相關資訊以供日人在華與他國競爭、以中日提攜之名培養日本在華勢力基礎，以及蒐集中國的情報作為日本制定對華政策的參考。因此，即使《順天時報》在創刊之初，標榜其目標為促進中國進步與中日合作，但也因為該報還同時身兼推動外務省對華政策之任務，使早期研究《順天時報》的學者多認為該報並未貫徹其最初中日親善的立場。¹⁷並同時詬病《順天時報》的主筆，皆清一色為所謂「中國通」的日本人，並無華人參

¹⁴ 如劉愛君，〈20世紀在華日本報人與中日關係——以《順天時報》為中心〉，《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2（貴陽，2006.4），頁36-39。

¹⁵ 〈本報緣起〉，《順天時報》（北京），1901年12月1日，1版。

¹⁶ 劉愛君，〈20世紀在華日本報人與中日關係——以《順天時報》為中心〉，頁37。

¹⁷ 吳文星，〈順天時報——日本在華宣傳機構研究之一〉，頁389-390、頁415。

與撰寫該報內容。¹⁸

（二）《順天時報》中「論說」的特色

然而是否如上述研究者所述，《順天時報》的內容撰寫並無任何中國人的參與呢？本小節將根據青山治世的研究，介紹該報「論說」的特色。主要以時序為軸，將《順天時報》所刊載之「論說」的型態與作者群結構，分成四期加以介紹說明。¹⁹

第一階段是初期，時間從1901年12月至1904年7月，是為該報創刊期，且該時期正值中國在經歷義和團事變後開始推行庚子後新政的階段，可謂《順天時報》創刊之際便躬逢清朝準備展開從中央主導改革的時機。該報在創刊初期便以政治、外交為中心，刊登許多類似於今天報刊中社論性質的文章，但其名稱並未固定，例如名為社說、雜錄、論說、雜俎的文章皆可歸於此類。加以在創刊初期該報的主要執筆陣容尚未完全固定，因此並非每期出刊報紙都有刊載所謂的「論說」，可推論該報當時仍處於摸索如何常態性且穩定性地發表社論性質文章的狀態。為解決此一問題，《順天時報》開始嘗試從投稿至該報的讀者中，選擇有前景的中國士人加入「論說」的執筆陣容，以確保其文章數量。也由此，《順天時報》「論說」的發展進入了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是前期，時間從1904年7月至1912年7月，正值清朝如火如荼推動庚子後新政，並且展開立憲運動的時期，朝野人士對日本各項近代化改革與制度等等與改革相關的內容都抱持著高度的關心。《順天時報》作為一個傳遞提供如何使中國更為富強的重要資訊管道，逐漸成為一些中國知識分子發表言論的平臺，而前述具有社論性質的文章，其名稱也逐漸確定為「論說」。

第二階段時期刊載的「論說」，仍然大多數未有作者署名；但若有署名的文章，則主要為王蔭南、勿用子與牟樹滋三位作

¹⁸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頁39-41。

¹⁹ 本小節主要內容根據青山治世，〈『順天時報』とその社論・論說について——形態と執筆者の変遷を中心に——〉，收入青山治世、關智英編，村田雄二郎監修，《『順天時報』社論・論說目錄》（東京：東洋文庫，2017），頁308-312整理而成，省略個別註釋。

者所著，且其中署名蔭南或王蔭南的約占大半。根據考察，這位王蔭南生平不詳，有可能是直隸出身，主要以塾師和學堂教員等職業維生，並擔任過徐世昌（1855-1939）家塾教師的王在棠。而時序到了1907年末，該報有署名的「論說」開始出現勿用子與牟樹滋等新作者。前者的本名與生平不詳；後者則可能是出身山東牟氏莊園的牟圻，有貢生功名並曾任職於郵政局，但其他經歷不明。²⁰直至1912年2月以宣統皇帝（1906-1907，1909-1911在位）宣布退位為止，《順天時報》的「論說」有署名之作者除了上述三人，又增加了幾位傾向革命（共和）派的執筆者。但這情形並未持續太久，從同年7月以後，《順天時報》的中國人「論說」執筆者便逐漸消失。

1912年7月至1917年3月，《順天時報》「論說」的變遷也進入第三階段的中期。青山治世指出，與第二階段包括署名與未署名作者所著「論說」之題材和內容的多元化相比，從1912年7月起，署名杞公的「論說」出現之後，第三階段「論說」的內容幾乎轉型成只討論政治，並多集中論述中日關係；加以使用詞彙和文筆風格與前述第二階段出現過的中國人執筆者有顯著不同，因而推測杞公可能為日本人。另一方面，在此階段「論說」的形式也出現變化，原本有作者署名的「論說」逐漸消失，若是中國人所著的文章，會以「來稿」、「投稿」或「來稿代論」等形式刊載；而大多數由日本人執筆的「論說」則以未署名的形式刊登。

1917年3月到1930年3月，為最後的第四階段，亦即後期。自1917年初左右開始，《順天時報》的「論說」以無署名的型態刊登已逐漸成為常態；1919年3月金崎賢擔任主筆後，直至該報於1930年停刊為止，「論說」（後改為「社論」）的文風與刊載形式更加趨於穩定。根據既有研究表示，第四階段時期每天刊登的

²⁰ 此階段清朝也正值科舉取士制度的變動時期，從八股改試策論、減少錄取員額，再到正式停廢，除了文化資源出現分配和轉移的現象，對士人而言，必須轉換跑道重新選擇職業亦是迫切的抉擇。因此士人投入報刊文章寫作，與此大環境息息相關，也代表新職業選項的出現。參見褚金勇，《從書籍到報刊：晚清文人的書寫轉型研究》，頁146-154。

社論皆為無署名，與當時日本國內發行的主要日報的社論刊載形式相同，顯示《順天時報》在第四階段的後期終於確立了其作為報紙的體裁。然而自民國時期，「論說」作者不再有中國人執筆者的這一變化，站在中國人讀者的角度，多被解讀為《順天時報》成為日本單方面的言論宣傳機關報。但自1910年代後期，中日兩國關係開始惡化，《順天時報》的「論說」執筆陣容裡不再有中國人存在也在情理之中。

若從現代報刊在東亞世界中扮演的「世界知識」之載體的角色，²¹以及報刊媒體嶄新塑造了一種作者和讀者、讀者和讀者之間能夠雙向，甚至三向互動的資訊場域，讓國家整體可以在同一時間點關心相同事物的特性來看，²²由外國人所創辦的報刊，包括《順天時報》在內，其發行地多在通商口岸或重要都市，發行量大並傳播即時性且現實性的內容，令人無法忽視其做為資訊與情報傳遞工具的重要性，其內容曾經發揮的作用力，及其對當時中國所帶來的影響。

而報刊在近代中國的轉型期，既是時事資訊的傳播者，也引入了各式新思想，刺激並帶動政治社會意識的變遷。不論是翻譯日本報刊內容、或是模仿日本發行的報刊，抑或是參考日本報刊記事寫成的文章，皆意味著日本就好似一雙「看不見的手」，提供了中國相當的動力來源。²³就《順天時報》而言，從開始發行到停刊，作為該報最主要的論述和主張，即為放在第一版的「論說」，²⁴其內容廣泛討論當時中國的政治、社會、教育、文化、對外關係等範疇，因此「論說」可做為理解該報對中國的立場傾向，與對當時中國各時勢現狀觀察和見解的主要資料。

²¹ 潘光哲，《創造近代中國的『世界知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12。

²² 褚金勇，《從書籍到報刊：晚清文人的書寫轉型研究》，頁78。

²³ 潘光哲，《創造近代中國的『世界知識』》，頁23。

²⁴ 本文所指的「論說」，為《順天時報》中所刊載，等同於現今報刊中社論性質的文章。

再由以上透過既有研究分析可知，《順天時報》中「論說」的執筆者並非如以往所指稱，全為日本人而無中國人插手之處，至少在民國成立之前，「論說」的執筆群確實包含少數中國人。這些撰寫《順天時報》「論說」的中國人作者，以非日本人身分在日本人所創辦、並由日本駐華領事館管理之下的報刊發聲，他們接受報刊即時傳遞與共享資訊的特質，因應政治社會需求，撰文討論清政府面臨的改革，參酌日本的經驗與資訊，表達自我意見的同時亦針對現實問題提出批判。而日本人作者也會觀察清末當時由中央所推行的多方面近代化改革，透過「論說」表達見解。其內容多為針對清朝政府改革政策的建議、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比較，或是介紹日本對清末改革的言論，以及個人的建言。這些「論說」的內容實為理解日系報紙對清朝教育改革的想法，以及日本國內相關言論與政策傳遞的良好對象。

綜上所述，本文嘗試藉由分析《順天時報》「論說」中與清末教育改革相關的內容，來看在清末庚子後新政時期，朝野一色以日本為改革主要取法對象的氣象中，作為日本在華且在北京所創的報刊，對於清末的教育改革有何觀察和見解，及其試圖傳遞的改革思想脈絡。

三、《順天時報》的「論說」對清末教育改革的觀察與見解

本文主要以庚子後新政時期（1901-1911），《順天時報》的「論說」中與清末教育改革相關的內容為討論對象，根據筆者統計其數量約有近百篇，²⁵其範圍涵蓋當時清朝所推行的所有教育改革政策。若進一步歸納其內容，則可從下列幾個主題來看《順天時報》的「論說」對清末教育改革的相關議論，並理解其如何結合日本明治時期的近代化轉移經驗和思想脈絡，以提出實質之

²⁵ 除1901年之外，從1902年至1911年，每年至少有30至50篇左右與教育議題相關的論說，且到1907年為止為高峰期。推測可能與當時清朝留日學生、清朝聘日本人教習，以及赴日視察的風潮多從1908年以後趨向沉穩有關。

建議。

（一）對清末教育改革全盤政策與訂立制度的綜合性建議

1902年年初，清朝任命張百熙（1847-1907）為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責成其擬定實施全國之學堂章程。他先是上奏摺請示籌辦京師大學堂，再參考歐美日各國之學制，並結合中國古制，於1902年8月完成《欽定學堂章程》（或稱《壬寅學制》），正式開啟庚子後新政中教育改革的序幕。

同一時期，《順天時報》開始刊載與清朝教育改革相關的「論說」，特別是對清末教育改革全盤政策與訂立制度的綜合性建議文章，大多集中出現於1902年至1903年，與上述清朝任命張百熙擔任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並賦予其統籌策劃近代教育學制與《欽定學堂章程》的頒布動向一致。

《順天時報》第一篇與清末教育改革有關的「論說」，刊載於1902年1月，題名為〈學制宜歸統一論〉。²⁶指出學校為教育之源與人才之淵，但中國自往昔以來，學校有三個弊端：一為名稱不統一，有書院、義學、學館等，學習內容不一致，且各自為政之弊；二為缺乏總辦教習人才，課程深淺不一或有所偏重、又無循序漸進之分級，學校與學生資格無法一統之弊；三為有學校又有科舉，使學生學業實難精進無法統一之弊。以上皆為中國學校教育既存之弊端，以及科舉選士制度對學校教育培養人才造成的影響。也因此該「論說」提出兩點統一各弊端之道，「一曰廢選舉（科舉）」、「一曰頒定制」。廢科舉才能使學校收育才之效，責成管學大臣頒定制，才能使官私立各類學校一律有法遵循。事實上在庚子後新政時期初始之際，朝野之士便多次提出意見，表示科舉取士會影響學校教育育才，²⁷是以縮小科舉規模抑或

²⁶ 〈學制宜歸統一論〉，《順天時報》，1902年1月18日，1版。

²⁷ 袁世凱著，天津圖書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廖一中、羅真容整理，《袁世凱奏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卷9，〈遵旨敬抒管見上備甄擇摺〉，頁271-272；清·陶模、德壽，〈奏請變通科舉摺〉，收入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收入《民國叢書》第二編第46冊，上海：上海書局，1990），頁100-101。或另參見清·張之洞著，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武

廢除科舉以利推動學校教育的意見攻防層出不窮，《順天時報》此「論說」的主張亦為這種言論風潮之一環。

進一步針對訂立教育定制的重要性，隔月《順天時報》的另一篇「論說」，討論管學大臣張百熙重新籌辦京師大學堂一事，針對其著手訂定設置大中小學堂的規制，盛讚「中國之學務於是乎有本矣」。²⁸並特別指出張百熙除計畫籌辦各級學堂之外，還注意到財源問題，視寬籌經費為辦學之源，此為確立教育的根本之一。另外關於學堂課程內容，該「論說」還主張應靈活擷取四書五經與經史子集之學而非拘泥固守，以利開啟民智。目前張百熙雖仍定四書五經為新學堂必讀書籍，但已規劃各年之進度，因此學制、規章以及課程的規畫都已呈現雛形。

而關於制定近代學制，〈學制宜歸統一論〉還認為應「內本周官之法則，外採日本之規模，參合時宜務盡美善」，將學制刊行成冊頒行天下後，各官立學堂與私立學塾均須一律遵循。該文首次開宗明義表示，應參考日本的學制來制定中國新的教育制度。這種應以日本為清末改革的參考對象之意見，不僅止於教育方面，還進一步指出日本明治維新所頒布的五條告示，乃喚起中國國民精神之根據，認為其都是「中國今日所亟宜師法者」，以求達到「尊順民心以共治其國，國強而君權益強」，因為其內容無一不合於「堯舜文武周孔之精意」，且皆為「中國甚需不可缺者」。²⁹在鼓吹以日本明治維新的改革為借鑑之際，為避免引發反感，不忘包裝日本改革新制內容實則包含多樣中國既有之傳統與舊制精神，而今則是禮失求諸野。

若進一步延續日本可提供給中國教育改革借鑒的主題，1903

漢：武漢出版社，2008），第四冊奏議，〈奏擬遞減科舉中額辦法摺〉，頁133-135；同書，〈請試辦遞減科舉摺〉，頁171-172。

²⁸ 〈讀張大冢宰籌辦大學堂第一疏書後〉，《順天時報》，1902年2月27日，1版。

²⁹ 〈論中國宜仿明治五條誓渙發大詔以喚起國民之精神〉，《順天時報》，1902年3月1日，1版；〈論中國宜仿明治五條誓渙發大詔以喚起國民之精神（續前稿）〉，《順天時報》，1902年3月5日，1版。五條告示內容為：一曰萬幾（機）決於公論、二曰上下一心經綸、三曰文武一途使庶民各遂其志、四曰一洗舊習一從公道、五曰求智識於宇內。

年《順天時報》在「論說」欄介紹嘉納治五郎（1860-1938）對中國教育的看法則更為具體詳盡。這篇〈支那教育問題〉原刊載於《新民叢報》，³⁰為日本東京弘（宏）文書院院長嘉納治五郎，對即將學成歸國的湖南省公費師範留學生所進行的演講。待《新民叢報》刊載完畢後，《順天時報》於同年2月分期刊登該文於「論說」欄。³¹嘉納治五郎表示，該批留學生皆是為學習教育負笈日本，便藉其歸國之際共享對中國現行教育問題的看法與建議。因而《順天時報》在該文前綴刊登目的，特意強調，「其所講述者，最關切於中國育英之務，特採錄之以為讀者講教育之一助」。

嘉納治五郎認為以中國當時情勢論之，最必要推動的是普通教育與實業教育，須先專注普通教育以打好基礎，才能逕習專門教育。而為何普通教育最為重要？源於普通教育須達成三個目的。第一為德育：道德教育。重點為養成國民，須教導國民明理並培養其善美之心，使其擁有智識以引導行為為善，最後自然而然地浸潤成為生活習慣。並進一步培養人民具備國民意識，不會只謀一己之利而謀害公眾之益。為使國民擁有德育之根基，「仍宜用孔子之道」。第二為智育：培養智識。包含生活上必須之基

³⁰ 〈支那教育問題〉，《新民叢報》（橫濱），23，1902年12月，頁105-120；〈支那教育問題（續第二十三期）〉，《新民叢報》，24，1903年1月，頁91-116。本文為日本東京弘（宏）文書院院長嘉納治五郎對即將學成歸國的湖南省師範留學生的演講，由中國留日學生楊度紀錄。

³¹ 嘉納治五郎演講，楊度筆記，〈支那教育問題〉，《順天時報》，1903年2月6日，1版；〈支那教育問題（續前稿）〉，《順天時報》，1903年2月7日，1版；〈支那教育問題（續前稿）〉，《順天時報》，1903年2月8日，1版；〈支那教育問題（續前稿）〉，《順天時報》，1903年2月11日，1版；〈支那教育問題（續前稿）〉，《順天時報》，1903年2月12日，1版；〈支那教育問題（續第二百八十三號）〉，《順天時報》，1903年2月20日，1版；〈支那教育問題（續前稿）〉，《順天時報》，1903年2月21日，1版；〈支那教育問題（續前稿）〉，《順天時報》，1903年2月22日，1版；〈支那教育問題（續前稿）〉，《順天時報》，1903年2月24日，1版；〈支那教育問題（續前稿）〉，《順天時報》，1903年2月25日，1版；〈支那教育問題（續前稿）〉，《順天時報》，1903年2月26日，1版；〈支那教育問題（續前稿）〉，《順天時報》，1903年2月27日，1版；〈支那教育問題（續前稿）〉，《順天時報》，1903年2月28日，1版。

礎與實用智識，以利維持生活。然若希冀進入高等教育深造，則須具備有預備之基礎智識。國民的智識程度與國家的智識程度成正比，亦與國力成正比。因此國家除卻德育之外，基礎與專門教育至為切要。第三為體育：身體強健。若要使國民能在世界上與其他種族競爭，須身強體健習慣勞苦，不可重文輕武。可以尚武精神在學校安排體操課程，並推行全國皆兵之制，甚至多成立醫學校，精進防災防疾之道，以保障國民之生存。

為有效達成上述目標，培養教員為當務之急，特別是小學校教員為國民之根基，必須設置師範學校以利培育。建設小中大學之學堂固為重要，然中國目前缺乏能進入大學堂學習的生徒，以及能擔任大學堂課程的教員，因此可暫緩而以小學堂為優先。

至於實業教育，應先探訪各省精通某種實業者，如植林、紡織或養殖，使其人先開講習會，根據經驗教授；再赴外國考察，判斷中國所需之實業教育，精進學理改良技術後開設學校。綜合以上，為嘉納治五郎根據清朝當時的教育情況所提出的建議，包含優先推動的教育項目、須達成之目標與實施手段。其中尤為值得注目的是，嘉納治五郎所強調的日本教育改革有關思想依據經驗之傳承。

日本在明治維新前後，教育所尊崇之精神背景屢有變化，從保守固執到重視泰西文化，再至舉國風靡歐化主義、崇尚自由民權之說，其後又沉靜回歸國粹保存主義，體驗了西化風潮與傳統思想之間的摩擦與融合。嘉納治五郎將之總結為，日本經歷了以歐化為主的騷動進步主義，也經歷了回歸傳統國粹的和平進步主義。在面對楊度（1875-1931）提出的，現在中國應需要歐化主義與國粹保存主義並重，才可救國；若採用和平進步主義而不進步，不若孤注一擲，破釜沉舟推動騷動進步主義的質問，嘉納治五郎表示，為避免兩派競爭危害，並造成政府與人民之間發生衝突，現今的中國實應採和平進步主義，以免重蹈日本之覆轍。

另針對當時清朝的教育改革，是否應效法日本明治維新初期大量引進西洋知識學說的疑問，他認為還是應擷取多元學說並加

以折衷，進而建議在教育改革與學術上「貴取於自有，而不貴取於外來，貴國向尊儒教，教育仍宜以儒教為宗」。然而這也並非意指完全隔絕他國學說，而是應取長棄短，透過教育養成國民之公德，使國家自立。教育改革時需要思想依據，而這些思想依據所導向的結果，皆須以不影響國家為優先考量。這也是嘉納治五郎積極傳遞的日本經驗。

（二）闡述精神與道德教育重要性的論述

前述嘉納治五郎對清朝教育改革的建議當中，他曾提及實施普通教育須達成三個目的之一為道德教育。〈砭訂德育策〉這篇「論說」便表示，西洋教育家認為智育、體育、德育三類中，德育最為重要。講德育，重視修行獎勵、發揚德行，闡明心理，「猶我國孟荀之論性也」。而日本明治維新之初所採用的教育倫理書籍，也多兼容中西之學。³²指出日本維新之際是如何實施道德教育。

〈論德育之關切甚重〉一文則提及，今日中國所言之各種教育，其根本在於道德，而道德之事，不僅賴於透過修身科目教之，其他學科如歷史、國文等內容，亦包含修身的意旨。另外還提出，國家要能善治、要能擅於競爭生存於世界，則不可捨棄德育，而若要進一步達到道德與精神教育的目的，則須尊崇孔子之道。「孔子之道，中國誇其名，日本行其實。中國以為修辭析義之具者，日本以為修身立國之道」。³³現今日本比中國要能加以實踐，才有今日富強之國勢。進一步點出，日本改革成功奠基於精神倫理基礎與尊崇孔子之道，此為中國所固有，更應加以借鑒。

蔭南撰文的〈論精神教育之要〉，表示「日本之振興教育者也，以融會東西洋之思想為目的，其治蒸然而日上，……夫固有導中國之先聲，而作之準者」。日本既以振興教育擴張國勢，令歐美各國不敢小覷，而中國若欲採用西洋自然科學於新式教育

³² 〈砭訂德育策〉，《順天時報》，1902年9月19日，1版；〈砭訂德育策（續前稿）〉，《順天時報》，1902年9月21日，1版。

³³ 〈論德育之關切甚重〉，《順天時報》，1907年3月21日，2版。

中，則更應良好運用既有之倫理精神。³⁴自小學至大學，必須設倫理修身科目，以改造將來的國民。³⁵力陳從日本經驗振興精神和道德教育。

為徹底實施精神與道德教育，設置修身課程便為具體的方式之一。早在 1902 年張百熙所制定的《欽定學堂章程》中，修身便為中學堂、小學堂與蒙學堂必修科目之一。³⁶不過真正落實近代學制內的修身課程內容，則是要待 1904 年《奏定學堂章程》的正式實施，除了規定中學堂、高等小學堂、初等小學堂修身課所應使用之教材外，更進一步指出修身之目的在於培養愛同類之知識，成為將來愛國家之根基，³⁷修身課程的目的與一己之身和國家世界的關聯甚深。³⁸簡而言之，在以國民教育為目標的清末近代學制中，修身為培養「國民」的手段。³⁹

也基於上述目的，修身一科在近代學制落實過程中便受到輿論相當的關注。《順天時報》在《奏定學堂章程》實施約三年後，開始陸續針對修身科的狀況提出看法。〈學堂當注重修身說〉這則「論說」先表示，日本教育學者認為在中小學的眾多科目中，「惟修身最為困難」。因為該學科不僅僅依靠智育理解字面便可受益，需要花費較多時間精力領略並切身實踐。而教授該科之教員條件又較為嚴格，「必其德望之隆，久為人所稱重，方

³⁴ 蔭南，〈論精神教育之要〉，《順天時報》，1910年7月6日，2版。

³⁵ 蔭南，〈論精神教育之要（續）〉，《順天時報》，1910年7月7日，2版。

³⁶ 〈欽定中學堂章程〉、〈欽定小學堂章程〉、〈欽定蒙學堂章程〉，收入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72），頁159、頁168、頁179。

³⁷ 〈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收入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頁288、頁299。

³⁸ 〈奏定中學堂章程〉，收入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清末編》，頁279。

³⁹ 土屋洋，〈清末の修身教科書と日本〉，收入並木頼壽、大里浩秋、砂山幸雄編，《近代中国・教科書と日本》（東京：研文出版，2010），頁286。另外方光銳也認為近代中國修身教科書的演變史，可謂「國民」的成立史與成長史，修身教科書直接傳授作為國民應有之姿態。見方光銳，《中国清末民初期の修身教科書と日本》（東京：東方書店，2019），頁1。

能見信於生徒，由是取古今歷史，謹擇其嘉言懿行，……以為教授之用」。然而現在的中國競爭興學，以求造就新人才，形成只重視講求實學的弊病，使修身一科逐漸形同具文。反觀「日本學制，雖多採之歐西，而其得力實在漢學，所尤注重者曰修身」。日本全國教育之所以普及，且國勢政治興隆繁盛，皆歸因於個人能自行修身之故。⁴⁰包含孔子之教在內的修身課內容，對於自身、家族、社會乃至於國家發展有極大關連。與尊孔一項同樣的強調日本以漢學為基礎，並重視實踐修身科目之內容，貫徹以傳統價值為改革之精神依據。

另外，伴隨著清末推行立憲，修身課程培養國民之目的更為受到注目。《順天時報》的「論說」力圖提供日本的道德教育和立憲的經驗。如〈論教育宜注重道德〉一文便論及，振興教育最極力促成的是教育普及，若普及，則人人皆知國民之必備條件為道德。道德教育乃以小學校為最重之要點，從小學校中開始道德立教，則人人皆明瞭知曉道德之重要，進而理解自身之權利義務，對「公益之事，合羣策羣力，以共相期於收成功，為利民計，為利國計」。透過道德教育養成平素之私德，並推己及人，「於私事之經營，必循規蹈矩，力勉前途，總期獲利於己」。⁴¹猶如日本學者井上哲次郎所論，教育能振奮個人之精神，此亦為國家精神之所峙。⁴²最終國民可以結合私德以構成大團體，以利國家與列強競爭。⁴³這點又可與〈教育宗旨〉中的「尚公」連結，強調以道德培養公之概念，並使人民透過道德教育的型塑成為國家奉公之國民。而具備這樣條件的國民實為推動近代化改革之國家基礎。

（三）討論尊孔的意義與日本之關聯

1905年，清朝成立學部，為近代中國第一個專門統籌全國教

⁴⁰ 〈學堂當注重修身說〉，《順天時報》，1908年5月28日，2版。

⁴¹ 〈論教育宜注重道德〉，《順天時報》，1911年10月3日，2版。

⁴² 蔭南，〈論精神教育之要（續）〉，《順天時報》，1910年7月7日，2版。

⁴³ 〈論教育宜注重道德〉，《順天時報》，1911年10月3日，2版。

育事務的機構。隔（1906）年 3 月，學部正式頒布由侍郎嚴修（1860-1929）起草的〈教育宗旨〉，訂立「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這五點教育要旨，此為中國第一次明文規定的教育宗旨。⁴⁴隔月《順天時報》便連續刊載四篇「論說」，以〈論尊孔之大義〉為題，討論教育宗旨中的尊孔，可以將其內容分為兩方面：一為尊孔與其他教育要旨之不同之處，及其在中國的意義；二為尊孔與日本的關聯。

關於尊孔在中國的意義，〈論尊孔之大義〉表示，「夫孔子，中國生民以來未有之聖人也。孔子之道，為宇宙之正道，人類之極則，……其為道也，至廣大亦至精微」，開宗明義點出孔子在中國社會中所佔之崇高地位，以及其在學問領域中之精萃。而「孔子之教，參天兩地因乎人類之自然，以定為秩敘」，因此「孔子之道，固不因西學而有所消滅，且可藉西學而有所發明」，顯示孔子學說不僅為中國傳統思想，且為社會秩序之定制，其底蘊之博大精深可與西方學說相容並蓄，不論教育、倫理、政治之道皆出自孔子之道，即便西洋學術並非孔子所發明，但兩者並不相悖。甚者，若從中國整體角度觀之，「尊孔教者，實出於國民普通之知識」，無論士人或婦孺皆知，因而「中國之尊孔，中國風俗習慣使然也。是以孔教之任在中國，誠為中國國家之命脈，尤為中國國民之精髓」。⁴⁵強調教育要旨中擬定尊孔一項，與孔教在中國之長遠歷史息息相關。也由於其特殊性質，因此尊孔雖為教育要旨之一，但忠君、尚公、尚武、尚實等精神與意涵皆寓於其中，⁴⁶在〈教育宗旨〉中看似五個要旨彼此獨立，「然於五端之中，更有扼其大要，足以兼容并包，而無所缺漏者，其惟尊孔乎」。⁴⁷

《順天時報》的「論說」在討論尊孔與日本的關聯之際，聚

⁴⁴ 參見周東怡，〈清末赴日視察風潮中知識分子的活動——以嚴修的教育活動及其貢獻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6（臺北，2011.12），頁263-266。

⁴⁵ 〈論尊孔之大義〉，《順天時報》，1906年4月7日，2版。

⁴⁶ 〈論尊孔之大義（續）〉，《順天時報》，1906年4月8日，2版。

⁴⁷ 〈論尊孔之大義〉，《順天時報》，1906年4月7日，2版。

焦於一個重點：即將看似傳統的尊孔作為中國近代教育的宗旨之一，不免予人與近代化改革相悖之守舊感，然實際上在鄰國日本自古傳誦來自中國的儒教經典，卻能加以實踐與活用，而對今日日本國勢之富強有所助益。〈論尊孔之大義〉一文便觀察到，「日本之制度文物，與其思想習慣，受我中國文化之影響，被我先聖道德之感化者，尤見其多」。所尊崇者無非是堯舜周孔之道，且日本在學習中國聖賢豪傑之精神行為之際，不拘泥文字末節，並將之融入自國歷史思想與習慣風俗，造就「一種剛健邁往，捨私奉公視死如歸之國民。所謂大和魂不外是，武士道不外是，愛國心仍不出是也」。⁴⁸而這些精神思想，不論是在江戶幕府時期、抑或開國維新之際，都為凝聚日本上下與行事之準則。

現在日本因明治維新輸入西方文明，國家制度或國民思想均朝向以進步為目的，但其教育方針並無違背孔子之大義。更有甚者，「日本假孔子之大道，以興盛其國家，以造就其國民。而孔子之道，復於日本始發其光輝」。⁴⁹而同一孔教，中國與日本皆尊之但國勢之強弱迥異，其緣故在於是否能夠變通實踐其內涵而已。

只要重視孔子學說與儒教，並切實實行其道，即使國家進行改革，採用西洋學說，亦無所影響。〈論尊孔重在實行〉這篇「論說」進一步指出，日本崛起東瀛，是因從中國傳孔子之教，而使其國家治理加倍興隆，並且以孔子學說陶鑄國民，做為人心精神之根本，使其風俗純良。因此日本「雖亦採泰西文明之法，造成今日之景運，惟其基礎之所由立」，與中國同宗孔子之故。⁵⁰現今文明競爭激烈，各國都強調以教育輔助政治之發展，因此以尊孔為教育要旨，便是以孔子之道當中重實行，且如實之失的特質彌補中國的弊端。

對於尊孔重在實行，〈論日本之實行尊孔〉一文再強調，日

⁴⁸ 〈論尊孔之大義（三續）〉，《順天時報》，1906年4月11日，2版。

⁴⁹ 〈論尊孔之大義（三續）〉，《順天時報》，1906年4月11日，2版。

⁵⁰ 〈論尊孔重在實行〉，《順天時報》，1907年1月21日，2版。

本與中國，同居亞洲，同文同種，「同受儒教之化」，但日本人能夠深入感受與理解其精髓，並潛移默化至自國傳統，因此「日人既奉孔教矣，非惟不流於固陋。甚且競強於文明，……而瞻亞東之全局，則惟日本是視，夫日本教育精神，所由隆其景運也」。⁵¹而當今中國要與世界列強競爭，則必須以尊孔為教育宗旨，並毫無虛偽的實行孔子之道，如此才能救中國於弊害。某位曾任職於北洋師範學堂的日本人教習，在談論他所眼見的中國教育改革情形，也指出孔子之教浸潤中國，指導人心既久且深，可以有餘力作為一統中國民心之主軸。教育宗旨將孔教作為基礎有其淵源，從中國教育史觀之，可謂最為適宜。⁵²

服部宇之吉（1867-1939）曾提及清朝的〈教育宗旨〉實為模仿日本〈教育敕語〉之產物，並指出 1906 年清朝命各省教育行政長官提學使赴日進行教育視察時，觀察到日本是如何實踐孔子之教，又是如何尊崇孔子的情形，因此歸國後建議在大祀由皇帝親自舉辦祭孔典禮，他表示這是日本對孔子的尊崇影響到中國的結果。⁵³明治天皇（1852-1912，1867-1912 在位）在 1890 年頒布〈教育敕語〉，其背景恰為日本正式制定憲法，確立立憲體制，而〈教育敕語〉作為大日本帝國的國民道德標準、以及教育根本理念，希冀透過學校教育培養國民忠君愛國的觀念。⁵⁴當時日本有志之士認

⁵¹ 〈論日本之實行尊孔〉，《順天時報》，1907年5月15日，2版。

⁵² 社友紫生，〈日人談中國教育事宜（續）〉，《順天時報》，1907年6月25日，4版。

⁵³ 服部宇之吉，〈支那に於ける孔子の尊崇〉，《東亞研究》，1：1（東京，1911.12），頁5-6。

⁵⁴ 〈教育勅語〉之原名為〈教育ニ関スル勅語〉，本文行文皆略稱為〈教育勅語〉。其漢譯如下：「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其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啓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者，不獨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斯道也，實我皇祖皇宗之遺訓，而子孫臣民之所當遵守，通諸古今而不謬，施諸中外而不悖。朕庶幾與爾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引自（日本）文部省編，《漢英仏独教育勅語訳纂》（東京：ヘラルド社，1931）；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

為，為挽救殖產興業和富國強兵政策，帶給日本社會道德實踐衰頹的弊害，毋須從外國引進道德學說，只要致力實踐孔子之思想道德即可。⁵⁵意即在日本行孔子之教為善美風俗與富強之基礎。可見日本尊孔一事，不僅僅是透過報紙傳媒傳遞至中國，且也透過清朝赴日視察官員的眼睛親自認證。

總結而言，〈教育宗旨〉中的尊孔，不僅僅是賦與傳統思想新的價值與作用，日本重視孔子學說與儒教的做法並未耽誤其近代化改革，此一經驗為清末中國進行的教育改革所取法。

（四）有關科舉停廢與後續配套措施的提案

從甲午戰爭前後時期至戊戌變法，再到庚子後新政，對於科舉取士的改良與停廢的相關議論，從未間斷。由於牽涉層面廣而複雜，直至庚子後新政時期才正式廢除八股文取士，並嘗試舉辦有別於科舉，且非常設的「經濟特科」，⁵⁶以求能通實學之人才。1903年3月袁世凱（1859-1916）與張之洞（1837-1909）上奏，要求逐年減少科舉錄取人數，⁵⁷使得科舉的停廢漸趨明朗化。⁵⁸

同年6月《順天時報》的「論說」便贊同廢科舉，延續前述1902年的主張，認為非科舉不能得人才之想法甚為荒謬，若真如此，則「今世在官者大半皆科舉中人，何至國家日貧日弱，竟有乏才之嘆」。⁵⁹認為並非科舉得人才，而是人才能在科舉中脫穎而出。進而指出「有學校而不廢科舉，則人才亦不出。……科舉之

1907514（2022/10/31）。

⁵⁵ 佐藤將之，〈成為「哲學家」的孔子、成為孔子的井上圓了——近代日本「孔子教」之淵源探析〉，《現代哲學》，2018：4（廣州，2018.7），頁119-130。

⁵⁶ 1897年貴州學政嚴修上奏提請開設「經濟特科」，設置內政、外交、理財、經武、格物、考工等六科以取通實學之人才。戊戌變法時將之納入教育改革的項目之一，但未能真正實施變法便告終，直至1903年才正式舉辦。但伴隨著1905年停廢科舉，「經濟特科」也僅實施一次便無疾而終。

⁵⁷ 清·張之洞著，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四冊奏議，〈奏擬遞減科舉中額辦法摺〉，頁133-135。

⁵⁸ 有關決定科舉停廢的政策決策過程，以及停廢後相關影響與社會連鎖反應，參見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修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⁵⁹ 〈科舉將廢說（續昨稿）〉，《順天時報》，1903年6月7日，1版。

人人深矣，舉世以科舉為重，亦孰肯從事於學堂，且學堂之難，如彼科舉之易，如此求其舍易而就難者有幾人哉。是知科舉之不廢，而學堂固有不能大興者」。⁶⁰力陳廢科舉之必要。

1905年9月清朝正式下令為實施近千年的科舉制度畫下句點，《順天時報》當月便立刻有「論說」，分成三階段討論科舉之停廢。首先是第一階段，感嘆科舉之弊。憤慨科舉之流毒已累積千百年，使近代學制推行初始想廣設學堂而不能興。在如此競爭激烈的時代，不講學科、不講正法、不講實業，則如何保障國權、增強國力。科舉的存在使人不能明知學校之利點，須先知科舉之害，才能知學校之利。⁶¹其次是第二階段，強調學校教育能興國勢。指出目前世界為學戰之世界，唯有重視與強化學校教育，才能國強興盛、國智大開與國民文明大興。科舉若與學堂並存，會使士人心存依然有晉身之階的僥倖，而使學堂無收效之日。而若就重視學校教育，日本為最佳模仿對象，因「日本取法歐西，文明進步，提倡學術，庠序如林。其所以躋於第一強國之地位者，非由學校之發達乎。我國自創辦學堂、或派生徒留學，皆以彼國為先河之導。竊願領取其教育之精神，……則異日學堂推廣，其利為無窮矣」。⁶²將學校教育的格局提升至影響國家強盛的層級，並以日本學校的發展與國勢強盛的關聯為例，增強此論點之說服力。最後是第三階段，具體化科舉停廢後學校教育應採取的改變。青年舉貢生員可進入各式學堂進修，以再造有用之才。在擴充學堂方面，當學堂成為教育之本源，其設置就必須普及全國，若僅靠官立設置，則經費與規模皆有限；而放眼世界各國，民立學堂居多，因此全國各地富紳巨族可多捐助資金，俾使學堂廣開以立基礎。在提升學堂素質方面，教員也應以身作則，盡力於學堂教育，為開國民智識盡心力。⁶³

關於科舉停廢後該如何安頓貢舉生員，成為朝野共同的課

⁶⁰ 〈科舉將廢說〉，《順天時報》，1903年6月6日，1版。

⁶¹ 〈恭讀停科舉廣學校上諭書後〉，《順天時報》，1905年9月6日，3版。

⁶² 〈恭讀停科舉廣學校上諭書後（續）〉，《順天時報》，1905年9月7日，3版。

⁶³ 〈恭讀停科舉廣學校上諭書後（三續）〉，《順天時報》，1905年9月8日，3版。

題。因為停廢科舉而驟然增加的生計和出路困擾，若未能妥善處理，將會衍生成為社會與國家層級的問題。關曉紅指出，科舉停廢後士子們的出路主要有以下幾種：1.參與舉貢、生員考試和優拔貢考試、2.進入省府縣各級師範學堂以及簡易師範就讀、3.出國留學、4.將私塾改為新式學堂，塾師變身為教師、5.從事其他教育文化、法政、軍事、行政、實業等新事業、6.繼續充當塾師。⁶⁴由此可以看出，進入新式學堂就讀，或是成為新式學堂教師等等與教育直接關聯的出路，依舊為士子們的首選。張之洞在1903年與1904年的上奏中約略表示，可讓三十歲至五十歲的貢舉生員入學堂與師範學堂，六十歲以上者充當文學科與經學科教習，⁶⁵便是一個最佳例證。

而值得注意的是，《順天時報》對於科舉停廢後，該如何安頓貢舉生員的配套措施，提出十分詳盡而且具體的建議計畫。例如〈科舉停止安置世人芻議〉等數篇「論說」列舉了各項貢舉生員可入之學校，以及學成後可擔任職務，並明白點出「為政府者，雖謀之以出路，而出者有限，與其量與出路，不如開以生路」。⁶⁶以專業訓練角度長遠規劃士子們的出路與未來發展。

首先，該「論說」列舉政法學堂、師範學堂、實業學堂、國文學堂、武備學堂、警察學堂等六種可讓貢舉生員就讀深造的學校，並詳述畢業後之出路。如政法學堂可擇年輕力強的貢舉生員入學，造就國家可用之政法人才，為將來立憲所需。而且聘用日本政法專門學者為總教習、留學日本法政大學的中國畢業生為助教，並仿日本政法速成科，必能培養對國家有益之人才。貢舉生員進入優級、初級、速成等各級師範學堂就讀，除學成後能成為新式學堂師資，減少各地小學堂以師資不足搪塞應設置數量的藉

⁶⁴ 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修訂版）》，頁249-255。

⁶⁵ 清·張之洞著，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第四冊奏議，〈奏擬遞減科舉中額辦法摺〉，頁133-135；同書，〈請試辦遞減科舉摺〉，頁171-172。

⁶⁶ 〈科舉停止安置世人芻議〉，《順天時報》，1905年9月21日，3版；〈科舉停止安置世人芻議（續）〉，《順天時報》，1905年9月22日，3版；〈科舉停止安置世人芻議（續）〉，《順天時報》，1905年9月23日，3版。

口外，還能培養學堂管理人才，從實質教學與行政管理層面雙管齊下提升新式學堂，特別是新式小學堂的素質。

另外士人雖為四民之首，但身無長技，殆科舉一停，實與遊民無異；進入實業學堂學習則可使士人學習專科，自保生計。進入國文學堂就讀則可能是與貢舉生員的專長最為接近的選項，建議於京師和各省特設一個國文學堂，其課程內容包含其經籍、中外歷史、中外輿地、中外政法，延攬擅長文藝、精通經史，並對中外輿地政法有所研究的士子就讀。畢業後除可充當中學堂與高等學堂的國文教員外，還可任職京師編書處，參與編輯書籍與教科書；或是在中央或地方行政單位擔任書記官，處理各項行政業務，也可任職各報館。又武備學堂原本應需要小學堂畢業生才可進入就讀，但現今缺乏符合資格的學生，而舉貢生員正好可以充數，若仿日本振武學校的模式，畢業生可作為新式軍隊的成員，以整頓尚武之精神。警察學堂亦在初創階段，舉貢生員本身已有知識基礎，適合進學；畢業生除擔任警察外，還可從事法律相關工作。總和而言，以上這些出路皆可使貢舉生員，「舊者化為新，無用者化而為有用矣」。不可諱言，各地方也應廣設學堂，特別是師範與實業學堂，除使士人有棲身之所外，更積極達到停廢科舉對學堂教育的正面意義。

（五）對推廣小學教育與修訂相關章程的議論

在庚子後新政初始時期，教育改革的重點放在高等教育。重開京師大學堂後，張百熙即派吳汝綸（1840-1903）赴日考察近代學制。當時許多日本教育界人士對吳汝綸表示，在新式教育初創階段，更應將心力放在能普及教育基礎的小學教育。同一時期，湖廣總督張之洞也派羅振玉（1866-1940）至日本考察教育，作為日後湖北省地方教育改革的參考。羅振玉也留意到日本相當重視作為義務教育的小學教育。⁶⁷日本文部省自 1872 年頒布《學制》後便盡全力拓展小學教育，要待 1877 年東京帝國大學才正式成立，至

⁶⁷ 羅振玉，〈日本教育大旨〉，收入璩鑫圭、唐良言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 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頁 224-225。

於其他帝國大學更要到1890年代末期開始才陸續設立。因此日本對清朝的建議是宜先建設小學教育，而為培養小學堂的教師，也必須致力於師範教育，此二者為教育改革上最優先的措施。⁶⁸

學部於1904年頒布《奏定學堂章程》，正式啟動清末的近代學制，《順天時報》的「論說」便針對如何推廣設置小學堂，以及如何精進小學堂所需之師資與教學內容，提出建議和提案。首先如同日本教育界人士向清朝官員所建議的，〈論今日推廣小學堂之辦法〉一文力陳普及教育之計為推廣小學堂，並宜盡速籌措經費，而為達到此目的則需要國家的力量。根據日本的地方學事通則，各地方學區小學校的經費，應由地方公產以及在地經營產業者共同負擔。在實際實行上並未出現流弊，因而建議清政府應及早倣行。⁶⁹試圖藉由日本經驗的背書，使推廣小學教育的建議更具說服力和可行性。

再鑒於日本近年之所以能因維新成功與戰事順利，一躍而揚名世界，實歸功於小學教育養成國民道德、國民智識、國民體魄，以塑造強大的國民。由於小學堂為造就國民的基礎，如何精進小學堂的「教」與「學」，便成為首要課題。為討論設置教育研究所的重要性，《順天時報》的「論說」進一步建議除了省會之外，更應在各府州縣的蒙養小學成立研究所，⁷⁰以達成以下三項目的：1.精進師資。集結各府州縣小學堂教師，共同討論教學技巧，以及適合中國小學教育的內容。⁷¹2.改良教學。認為小學教育首重在德育，並開發其心性良知、磨練其道德思想，使之存有良善之心並為善。⁷²其次是增進智育，理解身為國民與國家興亡之關係密切，激發其愛國熱誠。⁷³最後是磨練體育，可使學校生徒為軍國民，如同日本的大和武士道一般成為中國武士，尊崇尚武，躋

⁶⁸ 汪婉，《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視察の研究》，頁111-112。

⁶⁹ 〈論今日推廣小學堂之辦法〉，《順天時報》，1904年8月31日，2版。

⁷⁰ 〈論蒙養小學宜設教育研究所〉，《順天時報》，1906年6月17日，3版。

⁷¹ 〈論蒙養小學宜設教育研究所（續）〉，《順天時報》，1906年6月19日，3版。

⁷² 〈論蒙養小學宜設教育研究所（再續）〉，《順天時報》，1906年6月20日，3版。

⁷³ 〈論蒙養小學宜設教育研究所（三續）〉，《順天時報》，1906年6月21日，3版。

身成為世界強國。⁷⁴3.規劃學務。現今小學教員並非全為師範出身，教育研究所可以發揮互補討論，使教師們的教法齊一的功能；再者可破除教師們原有之舊見或盲點，使教學整體進步。更可整頓學務，使學堂管理員、教師與地方仕紳皆能共謀小學教育之利益。⁷⁵最終達成造就強大國民以伸張國家勢力的目的。

在清初創近代學制，推行小學教育初期，《順天時報》的「論說」先呼應前述嘉納治五郎對清朝整體教育改革的建言，緊接著表示可以日本過去三十年逐步推動與修正的經驗為範本，減緩或解決清朝在實施新學制時可能遭遇的難關，並更進一步討論到清朝還未投注心力的教育行政，倡言其與教學具有同等重要性。待《奏定小學堂章程》頒布實施五年後，其制定內容與落實需求之間產生差距的問題逐漸地浮上檯面，因此 1909 年與 1910 年學部先後針對《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與《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的問題點加以修訂。⁷⁶

《順天時報》的「論說」秉持對改革的敏感，在學部修訂初等小學堂章程的同月，便刊文表示贊同。該文先指出，小學為大學之基礎，其教育不宜產生貽誤。但「迄今數年，各地方所立初等小學堂，如寥落晨星，辦理又未能稱善，私塾則勒令停止，民之子弟入學者，非惟不日見其多，而且倍形加少」，點出小學堂設置的狀況不如預期，且屢屢出現辦理不佳的窘境。因此最近學部的奏摺奏請「將初等小學堂章程酌量變通，分定三種辦法，請旨飭令各省督撫率提學使酌度地方情形，無論官學私塾，均須一體遵照。試取其學科程度，擬諸前此奏定者，簡易科分兩類，使民自為忖度，擇其力所能至者行之，……而於完全科原定課程，亦為之變通裁併，總期教育能普及」。⁷⁷支持此次的修訂除更動小

⁷⁴ 〈論蒙養小學宜設教育研究所（四續）〉，《順天時報》，1906年6月22日，3版。

⁷⁵ 〈論蒙養小學宜設教育研究所（五續）〉，《順天時報》，1906年6月23日，3版。

⁷⁶ 關於兩次修訂的詳細經緯，參見周東怡，〈清末《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與《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的修訂〉，《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0（臺北，2018.12），頁79-118。

⁷⁷ 〈論變通初等小學章程事〉，《順天時報》，1909年5月23日，2版。

學堂原有完全科的學科內容，以及將簡易科分為兩種的措施。

事實上，學部這次針對小學堂章程更重要的修訂在於課程內容，⁷⁸但此文主要將焦點放在簡易科的變化而未觸及其他與小學堂課程更關鍵性的修訂，顯示出該論說更關注的是教育普及，與前述各項論說一貫強調小學教育重要性的脈絡相符。並重申，「今而後辦理初等小學堂者，遵此三種辦法，實事求是，以期收成效於將來」。⁷⁹並以日本為例，表示教育制度之所以盡善是因為其間不知幾經改良，肯定學部此次針對小學堂章程的修訂，並期望不可假借修訂之名而朝令夕改，使民無所適從。

其後，清政府的教育改革措施逐漸配合政治改革之需求。1906年政府宣布預備立憲，兩年後公布了預備立憲逐年籌備事宜，⁸⁰學部也在1909年配合提出教育分年籌備事宜，⁸¹以期增進識字率進而培養立憲所需之國民。圍繞立憲與教育，《順天時報》的〈論小學教育之要〉再次重申國家富強與振興教育的關聯，若要籌備立憲，非教育普及不可行。首先要小學教育訂為義務教育，即為強迫教育，開啟子弟智識才能養成忠君愛國的精神。並且建議同年在京師成立的中央教育會可多著召集教育家討論普及教育之法。⁸²作為即將立憲之國家，小學教育的制度可代表教育對國家的意義。

學部配合預備立憲的最初措施，便是在1909年與1911年公布與

⁷⁸ 主要為刪減完全科的必修科目、增加國文科授課時數、因編纂教科書而使更加具體規定課程內容，並以此為基礎將簡易科分成兩種。周東怡，〈清末《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與《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的修訂〉，頁89-96、頁100-101。

⁷⁹ 〈論變通初等小學章程事〉，《順天時報》，1909年5月23日，2版。

⁸⁰ 〈憲政編查館資政院會奏憲法大綱暨議院法選舉法要領及逐年籌備事宜摺〉，收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61-67。

⁸¹ 〈學部奏報分年籌備事宜摺〉，1909年4月（宣統元年閏二月），收入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頁603-604；〈學部奏酌擬改訂籌備教育事宜摺〉，1911年1月（宣統二年十二月），收入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頁684。

⁸² 〈論小學教育之要〉，《順天時報》，1911年7月30日，2版。

修訂簡易識字學塾章程。⁸³《順天時報》指出簡易識字學塾，可使「通國人民，或年長失學，與夫年幼赤貧者，咸從事讀書識字」，以開民智，因此「所當推設也」。並站在普及教育的角度指出，「此籌識字學塾之設，重在簡易，以便普及於教育為主。除於各項小學堂，附設此學塾外，又須利用從前所有村夫子改良私塾等，使任茲教育事，以資普及，最為稱便」。可聽任各府廳州縣勸學所、督學局及提學使，指示地方官設置，顯示其便利性。至於設置的時機，「非中國擬實行立憲，欲躋於文明之時乎？教育未普及，而徒曰實行立憲，未可也。然欲實行普及教育法，則尤屬籌備立憲之要政，不可以置為緩圖。而如推廣簡易識字學塾事，在學部所當迅速籌辦者」。當時中國上下皆希望能快速改行立憲，「故此等學塾，果能普及，教育之振興，自莫之能禦，與實行立憲之成績，大有密切之關係」。⁸⁴表現出一貫重視教育普及以利立憲運動推展之態度。

（六）關於女子教育的看法

眾所周知，中國首次出現與女子教育相關的規定，是在 1904 年頒布的《奏定學堂章程》。然則，當時女子教育並未有獨立章程，而是內包於《奏定蒙養院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規定：「家庭教育包含女學」，「所謂教者，教以為女、為婦、為母之道也」。⁸⁵可以理解在清末近代學制中最早出現的女子教育，其實是被視為家庭教育的一環。

直至 1907 年，清朝政府終於更加正視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基於以西方人為主經營的教會學校以及改革派人士設置女學，使民

⁸³ 〈學部奏遵擬簡易識字學塾章程摺〉（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收入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頁627；〈學部改訂簡易識字學塾章程及授課表〉（宣統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學部官報》（北京），148，宣統三年三月初一日，本部章奏頁3-4。關於簡易識字學塾的設置經緯與發展及其影響，參見周東怡，〈清末教育法制化歷程的一個側面：預備立憲時期的簡易識字學塾〉，《法制史研究》，34（臺北，2018.12），頁141-175。

⁸⁴ 〈論普及教育重在簡易識字〉，《順天時報》，1911年3月8日，2版。

⁸⁵ 〈奏定蒙養院及家庭教育法章程〉，收入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頁309-313。

間增加了許多女子學校，有必要增設章程加以管理。⁸⁶加以當時亦普遍認為女子的智慧及智力並不亞於男子，振興女子教育對國家富強也有所助益這兩點，⁸⁷頒布《女子師範學堂章程》36條和《女子小學堂章程》26條，使女子教育不再附屬於某個章程，而是真正在清末近代學制中擁有獨立的地位。

在兩次學堂章程陸續頒布的時期，《順天時報》亦出現討論女學的「論說」。1903年的〈振興女學議〉表示，近日京師開始設置女學堂，卻因風氣未開招生不易而暫行停辦。⁸⁸現今興辦的學堂除京師大學堂和各省城大學堂之外，各府州縣鄉設置中小學堂，多受限於經費拮据或意見紛紜；女子若非官款而是自行籌辦，則更難獨力而成。⁸⁹進一步批評以往認為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弊病，使女子須依賴父兄負擔生計，無法生利。又牽制男子無法投筆從戎或立功異域，使中國貧弱。中國當時號稱四萬萬人，女子便佔一半，不讀書又不就業無異於廢人，此乃歐美各國日益強盛而中國日益衰弱之故。⁹⁰為解決此問題須振興女學，先透過推廣放足以及閱報，待風氣大開、經費充裕大興包括女學在內的學堂後，必能解決此問題。⁹¹強調不分性別的學習可使國家增加生財之人，以達到國家富強此一重要目標。

1905年正值清政府開始推動立憲運動，培養能夠理解並參與憲政的國民成為當務之急。《順天時報》的「論說」除了一貫強調重視小學教育為培養國民之根本外，也提示女子教育對此能發揮的重要性。〈論女子教育為興國之本〉一文開宗明示，「建造國家，必賴良國民。養成良國民，必恃國民之賢母。養成國民之賢母，是在女子教育」。女性為國民之妻，亦為國民之母。⁹²這也

⁸⁶ 崔淑芬，《中國女子教育史——古代から一九四八年まで》（福岡：中国書店，2007），頁153-168、頁170-180。

⁸⁷ 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頁198-201。

⁸⁸ 〈振興女學議〉，《順天時報》，1903年5月21日，1版。

⁸⁹ 〈振興女學議（續前稿）〉，《順天時報》，1903年5月28日，1版。

⁹⁰ 〈振興女學議（續前稿）〉，《順天時報》，1903年5月26日，1版。

⁹¹ 〈振興女學議（續前稿）〉，《順天時報》，1903年5月28日，1版。

⁹² 〈論女子教育為興國之本〉，《順天時報》，1905年8月13日，3版。

意味著以教育促進國家富強已不再局限於只為男子的責任。從另一角度而言，向來主要對象為男性且科舉取向為主的教育型態，因停廢科舉及推展新式教育而逐漸產生變化，培育人才從知識取向進化到道德智識全方位的國民。至於如何強化女學，則應先突破女子無才便是德之窠臼、剷除纏足之惡習，並強健婦女身心；其次是儲備師資，可借鑒地方做法，聘請日籍女性教師並讓中國賢淑婦女在旁學習教學與管理，另須派縉紳婦女留學日本以速成。⁹³

待開設女學風氣逐漸大開後，擬定教育宗旨便成為急務。一方面是为確立教育女子之法；⁹⁴另一方面卻又認為當女學大開後，很難不養成擁有新思想新智識，要求與男子享有平等權利之女子。其流弊為個性從依賴變為獨立，不肯輕易與人為妻，並在學界政界與男子競爭且發生衝突。建議女子教育的宗旨，應是「擇選東西國（指歐美日本）之文明，調和中國舊有之道德」，「宜趨重道德，以養成賢女賢婦賢母」。⁹⁵

由於中國女學目前多為私人設置，教法參差，學部宜制定教育之法，首先須訂立師範規程。再者，近來中國注重女學為受到日本之影響，兩者文明同源、社會道德亦類似，而「女子普通之本分，直在為人妻，為人之母，修理內政，教養子女等事」。⁹⁶點出教育子女為女性之義務與天職。「男女天性，既不能強齊，其本分亦迥然各別，故教育之事，女子決不能與男子同」。⁹⁷女子若是學有所長，獨立於社會並與男子競爭，則失去女子教育的意義，只有作為賢女賢婦賢母，才能生養培育優秀的國民，此為國家實力強大之根源。且今日國際競爭時代，家庭教育為政治之要務，而此要務奠基於女學。在推廣小學教育之前，必須以來自母

⁹³ 〈論女子教育為興國之本（續）〉，《順天時報》，1905年8月15日，3版。

⁹⁴ 〈論女子教育宜定宗旨〉，《順天時報》，1906年5月13日，3版。

⁹⁵ 〈論女子教育宜定宗旨〉，《順天時報》，1906年5月13日，3版。

⁹⁶ 〈續論女子教育宜定宗旨〉，《順天時報》，1906年5月15日，3版。

⁹⁷ 〈續論女子教育宜定宗旨〉，《順天時報》，1906年5月15日，3版。

親的教導為根基，女學為所有教育的最初級。⁹⁸再者，女性不可對男性所從事的各項事務造成窒礙，而是要能有所助益。⁹⁹塑造出女學盛則家庭教育安定，連帶國家才能強盛的公式。

在討論制定女子教育宗旨時，《順天時報》的「論說」強調女子作為人妻人母的教養與男子教育有所不同。這可能與1880年代以後日本女子教育觀的變化有密切關聯。明治維新新政府雖然在1872年頒布《學制》、1879年頒布《教育令》、隔年再進行大幅修改，¹⁰⁰但教育系統基本上仍是以男子為主，女子教育系統並未獨立存在。當時認為女子教育與國家安危息息相關，在江戶時代，只要求女性作為武士順從的妻子，並未期待其身為母親的角色，因為教導孩子是父親作為家長的要務。然而維新後的日本邁向近代化社會，教育的目的從繼承家業轉為培養對國家有用的國民，如此一來，女子教育必須培養女性政治社會能力與知識，才能成為養育未來國民的有能母親，¹⁰¹強調男女之間的性別分擔，並合理化男女的差異。¹⁰²待1890年代末期，女子中等教育正式納入日本教育體系後，教育女子的目的為培養「賢妻良母」此一取向越發顯著，各種以女性為受眾對象的雜誌也屢屢強調女性在「家庭」中管理家事和育兒對促進闔家和樂的重要性，為女子在性別分擔中的角色擴大提供理論基礎。¹⁰³

大約同時期，晚清中國改革派人士與知識界，亦相當積極的探討與摸索女子教育和女子地位，自甲午戰後，出現許多宣導提倡女性地位的報刊，其中發行時間較久、冊數較多，刊登內容也較豐富的，首推《女子世界》。¹⁰⁴在新學制頒行後，女子教育與

⁹⁸ 〈論女學關於政治最切〉，《順天時報》，1907年3月16日，2版。

⁹⁹ 〈論學部通飭女學堂事〉，《順天時報》，1907年4月10日，2版。

¹⁰⁰ 佐藤信、五味文彦、高埜利彦、鳥海靖編，《詳說日本史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2017），頁400-401。

¹⁰¹ 牧原憲夫，《民權と憲法》（東京：岩波書店，2010），頁148-149。

¹⁰² 牧原憲夫，《民權と憲法》，頁150。

¹⁰³ 牧原憲夫，《民權と憲法》，頁151-152。

¹⁰⁴ 《女子世界》發行期間為1904年到1906年。有關該雜誌的主編、作者群，以及雜誌內容分析，參見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女學堂亦更加受到討論。〈論中國女學不興之害〉一文指出，男女生於世都有天賦權利和競爭生存的能力，但中國女學一直不興，對於個人、家族、社會與國家都有害。¹⁰⁵對個人之害包含女子聽從男子要求纏足損害身體，並因為無才便是德的思想而淪為男子附屬品，失去個人智識與德行。對家族之害有無法生利並拖累家人、因纏足體弱而影響子女健康，以及智識不足而無法負擔家庭教育之責等等。對社會之害是迷信，因參與宗教活動為少數不受限的女性活動，容易沉迷其中。對國家之害則為亡國和亡種之源。聽聞女權越盛其國越文明，然今日中國女子非廢即弱，遑論女權，此為亡國之源。又女子為國民之母，為種族的來源，纏足體弱易導致種族競爭不利而滅亡，此為亡種之源。因此中國需要振興女子學校，奮發女子的生存競爭能力、振興其天賦權利、使其不依賴男子，自行努力於學問，而中國有望指日可待。

單就上述內容不難發現，清末中國輿論界在討論女子教育時，皆會重視女子學習知識、重啟智識、能生利對國家發展有益，並且成為能教育子女、保國保種的國民之母等等目的取向。這與一貫的改革走向和富國強盛的最終目標息息相關。然而以〈論中國女學不興之害〉一文為開端，其後《女子世界》的討論聚焦在興女學與爭女權孰先孰重。一派認為提倡女權必須要有先決條件與時機是否適合的前提，即應先養成女子的學識道德；另一派則反駁表示，權利為生來即有，教育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不應該具備所謂的資格後才能享有女權。然而在當時的中國，除非有整體國家制度、社會狀況的配合，否則很難獲得完全的女權。¹⁰⁶最後塵埃落定，在〈論復女權必以教育為預備〉一文中，提出先興教育才能強化女子的能力、加深其見識並理解公義大德，最後使其懂得抉擇。「中國女子，不患無權，患無馭權之資格；不

2004），頁67-113。

¹⁰⁵ 竹莊（蔣維喬），〈論中國女學不興之害〉，《女子世界》，1：3（上海，1904.3），頁1-7。

¹⁰⁶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84-88。

患無馭權之資格，患無馭權之預備」，¹⁰⁷興女學振興女子教育為實現女權的基礎。

透過前述可以得知，同為輿論界的聲音，《順天時報》的「論說」和《女子世界》的刊文，雖一樣重視女子學習知識、重啟智識、能生利對國家發展有益，並且成為能教育子女、保國保種的國民之母等，然而在討論女子教育以其所帶來的影響之際，有著截然不同的目的性。後者的主張是透過興女學塑造與完善實施女權的個人素質和環境條件，著重興女學與個人的關係。前者則強調透過女子教育培養的女性，對正在面臨改革，以及追求富強的國家，能夠發揮的實質性作用。《順天時報》作為日系在華報紙，其「論說」主要目的在於對清傳遞和提供日本的改革思想與建議，偏重於從對國家現實需求發展有利的角度，提供有效的手段。與《女子世界》這樣的民間輿論刊物相比，強調改革方式與結果對國家的利益。因此對女子教育，更傾向著重描繪女學盛則家庭教育安定，連帶國家才能強盛，具有上對下的目的性。

《順天時報》其後對女子教育的「論說」內容走向亦是遵循此脈絡。待女子教育章程獨立頒布後，〈論女學教育宜慎其始〉一文指出，「教育之係於國家也重，女學之重教育也尤切。……今我中國鑒於女子教育，實有利於家國，於是熱心志士，以振興女學為要務，為之廣立學堂焉，為之編學堂課本焉，為之定課程明規則焉」，首先肯定制定獨立的女子教育章程實為對當時中國國勢之發展有益，緊扣一直以來該報論說所主張的女學興國論。然而該教什麼、又該如何教，則成為必須謹慎看待的課題。該文指出過去私人女學有賴外洋女教士充任教習，但因宗教問題，「恐利益之得者鮮，弊之生實難預防也」。而今日「中國既知女學不興之害，振興乎女學教育之事，不必遠取諸歐美，即近觀日本女學，考察其教育法程如何，以作我準繩」。¹⁰⁸明白指出日本

¹⁰⁷ 丹忱，〈論復女權必以教育為預備〉，《女子世界》，2：3（上海，1905.3），頁1-3。

¹⁰⁸ 〈論女學教育宜慎其始〉，《順天時報》，1907年6月1日，2版。

女學之法為中國所應借鑒者，特別是日本能一躍成為帝國主義，是因為不分男女，皆有愛國之念，故其國勢才能有今日之強。強調借鏡日本標準興女學與西方之差異。

隨著科舉改廢，學堂教育成為培養人才的主流，對教員需求的急增自不待言。學部也於 1907 年頒布《女子師範學堂章程》，以培養女子學堂教員為宗旨，在該章程頒布後，亦引發輿論討論女子師範，點出中國當時正值立憲運動時期，教育普及實與立憲相關甚大，只「注重男子之學，女學缺焉不講，則家庭教育之不知，尚可謂教育普及乎」？因此振興女學乃是普及教育之重要措施，特別是現今「中國為預備立憲事，……知女學為興國之基，……奏請設女子師範學堂，以為振興女學之地」，誠乃高見。並指出「中國能造就女子師範，以教各直省女同胞，則女子之體育壯德育正智育深，其資格先已養成，能力幾與男子等」。強調成立女子師範後，女性教育不論是在德智體方面的訓練皆不遜於男性。如此一來，在實行立憲之際，不論男女皆因教育而「各養成其德行，以啟發國民進取之志，則時至實行立憲，自綽然有餘裕」。且「俟女子師範養成後，以之曾教育於全國，則道無難言矣。於實行立憲，不得謂小補，膺創辦女子師範學堂之任者盍勉旃」。顯示在推行立憲之際教育普及之重要與女子師範教育所能發揮的功能。¹⁰⁹當然，這不僅僅代表女子教育做為新式教育一環的意義；更進一步而言，也可認為女子師範學堂畢業生除了擔任女子學堂教員之外，還被期待能夠成為所有新式學堂教員的生力軍，使受過女子教育的女性能發揮更進一步的功能。因此就獨立制定女子教育相關章程本身而言，可謂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四、結論

本文主要以《順天時報》的「論說」為主，從（一）對清末教育改革與訂立制度的綜合性建議、（二）闡述精神與道德教育

¹⁰⁹ 〈論奏設女子師範學堂〉，《順天時報》，1908年7月12日，2版。

重要性的論述、（三）討論尊孔的意義與日本之關聯、（四）有關科舉廢止與後續配套措施的提案、（五）對小學教育修訂的議論、（六）關於女子教育的看法等六個方面，分析與清末教育改革的相關內容。

《順天時報》作為在華發行長達三十多年的日系機關報，傳遞知識和資訊，刊載的內容具有即時性和時效性，多討論當代的現實問題和思想，其做為資訊與情報傳遞工具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該報內容曾經發揮的作用力，及其對當時中國所帶來的影響，實為一個理解日本對清直接傳遞和提供改革思想與建議的重要對象。

「論說」的執筆者在清末時期包含日本人與中國人。中國人作者因應政治社會需求，撰文討論清政府面臨的改革，參酌日本的經驗與資訊，表達自我意見的同時亦針對現實問題提出評論。而日本人作者則善於觀察清末當時由中央所推行的多方面近代化改革，所撰「論說」內容多為針對清朝政府改革政策的意見、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比較，或是介紹日本對清末改革的言論，以及相關建議。

《順天時報》的「論說」對清末教育改革制度上的觀察與建議，包含提供制度改革的構想，以及制度制定同時與實施後的建言。對於對清末教育改革與訂立制度的綜合性建議屬於前者，在《欽定學堂章程》頒布前，「論說」內容便集中於闡述近代教育體系架構的建立準則，特別是日本是如何建立起近代學制的框架，抑或是日本如何融合傳統與近代思想的作法，透過「論說」的言論，提供改革在思想層面的傳遞與移植，傳達給清末政府一個重要訊息：日本的改革經驗良好地融合新舊內外的衝突，這個範本提供避免失敗的危機，以及減少可能會繞的遠路。這點無庸置疑地展現出「日本模式」的多元性，日本所提供的，不僅止於既有改革的框架，更有深層的思想概念的再重塑。

對女子教育的看法亦屬於前者，這是屬於傳統中國既有教育範疇中不曾有的討論對象。《順天時報》在《奏定學堂章程》並

未單獨制定女子教育相關規定之際，便透過「論說」強調女子教育培養的女性，應要能對正在面臨改革，以及追求富強的國家，發揮實質性貢獻。值得注意的點，莫過於強調女子受教育後，能夠為國家帶來的利益。這包含了提升個人的經濟生產能力、增進個人的智識，以及作為賢妻良母將下一代培育為對國家有所助益的國民。這點與當時中國其他女子教育相關論點顯著迥異，體現出「日本模式」思想層面的重要構造，即改革成果要能為國家政府服務的上對下視角。

其餘「論說」的性質大致屬於後者，例如向中國力陳在制定教育改革相關政策時，精神教育與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首先強調以修身科目中傳統儒家知識養成私德，進而培養人民為為國奉公的國民。再以教育宗旨中的「尊孔」為最佳例證，除了分析與強調孔子學說與儒教作為中國長久以來的思想與道德根據，實為在制度與政策變化之際，鞏固與穩定人心的軸心。日本重視孔子學說與儒教的做法，對其近代化與富強政策，非但不為阻礙，反而更為助力。因此這也是中國教育改革的良好範本。

另外對於停廢科舉，早在 1902 年，《順天時報》的「論說」便提出不廢科舉學堂教育便不興的論點。對於沒有科舉制度，一直以來皆以學校教育作為培育人才手段的日本而言，廣設且多元化成立學堂，才是教育改革的重點。關於科舉廢除後貢舉生員的出路，「論說」的建議方案甚至比當時清政府的相關配套措施都要詳細與具體，特別是士人身無長技，以專業訓練角度規畫其未來發展有其絕對的必要性。這點與明治新政府處理因改革推動四民平等，而失去特權的武士階層在維生時遭遇困難而導致社會危機的經驗息息相關。

設學校與廢科舉這兩者的發展互為表裡，為有效推動學校教育與育才，培養教學人員、精進教學內容與訓練行政管理人才皆為重點，上述措施與科舉改廢後士人的出路結合，最終以達到培養國民富強國家的目的。《順天時報》的「論說」對清末小學教育改革的另一個著眼點，為普通教育的普及，意即實施義務教

育，透過義務教育開啟民眾智識並培養國民意識，如此才可有利於立憲的推行。

綜上所述，本文嘗試藉由分析《順天時報》的「論說」中與清末教育改革相關的內容，來看其對於清末的教育改革有何觀察和見解，以及試圖傳遞的改革思想脈絡。這些「論說」的內容為理解日系報紙對清朝教育改革的想法，以及日本國內如何傳遞相關言論與政策的良好對象。不可諱言，《順天時報》的「論說」對清傳遞和提供日本的改革思想與建議，偏重於從對國家現實需求發展有利的角度，提供對維護國家統治有效的手段，凸顯出「日本模式」的多元樣貌，不僅提供改革的有形範本，更富有思想層面的元素，呈現概念的再型塑。以長時段並且多角度的面向，來進行分析《順天時報》的「論說」對清末教育改革的觀察與建言，亦發揮作為釐清清末教育改革中的中日關係的另一個側面的重要作用。

（責任編輯：林煒恩 校對：李菡容）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一）報紙與期刊

《東亞時論》，東京，1899。

《順天時報》，北京，1901-1911。

《新民叢報》，橫濱，1902-1903。

《學部官報》，北京，1911。

（二）專書與史料彙編

清·張之洞著，趙德馨主編，《張之洞全集》，武漢：武漢出版社，2008。

袁世凱著，天津圖書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廖一中、羅真容整理，《袁世凱奏議》，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9。

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收入《民國叢書》第二編第 46 冊，上海：上海書局，1990。

璩鑫圭、唐良言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 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

（日本）文部省編，《漢英仏独教育勅語訳纂》，東京：ヘラルド社，1931。

多賀秋五郎編，《近代中国教育史資料・清末編》，東京：日本學術振興會，1972。

東亞同文會編，《對支回顧錄（上）》，東京：原書房，1968。

（三）時人論文

丹忱，〈論復女權必以教育為預備〉，《女子世界》，2：3，上海，1905.3，頁1-3。

竹莊（蔣維喬），〈論中國女學不興之害〉，《女子世界》，1：3，上海，1904.3，頁1-7。

服部宇之吉，〈支那に於ける孔子の尊崇〉，《東亞研究》，1：1，東

京，1911.12，頁1-10。

二、近人專書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4。

方漢奇，《中國近代報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褚金勇，《從書籍到報刊：晚清文人的書寫轉型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1。

熊賢君，《中國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潘光哲，《創造近代中國的『世界知識』》，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方光銳，《中国清末民初期の修身教科書と日本》，東京：東方書店，2019。

佐藤信、五味文彦、高埜利彦、鳥海靖編，《詳説日本史研究》，東京：山川出版社，2017。

汪婉，《清末中国対日教育視察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8。

牧原憲夫，《民権と憲法》，東京：岩波書店，2010。

阿部洋，《中国の近代教育と明治日本》，東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0。

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お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過程》，東京：福村出版株式会社，1993。

崔淑芬，《中国女子教育史——古代から一九四八年まで》，福岡：中国書店，2007。

三、近人論文

朱宏源，〈清末新民叢報、東方雜誌和民報對立線的意見（上）〉，《食貨月刊》，13：7、8，臺北，1983.11，頁 302-318。

朱宏源，〈清末新民叢報、東方雜誌和民報對立線的意見（下）〉，《食貨月刊》，13：9、10，臺北，1984.1，頁 424-442。

吳文星，〈順天時報——日本在華宣傳機構研究之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6，臺北，1978.5，頁 389-438。

佐藤將之，〈成為「哲學家」的孔子、成為孔子的井上圓了——近代日本

- 「孔子教」之淵源探析》，《現代哲學》，2018：4，廣州，2018.7，頁119-130。
- 周東怡，〈清末赴日視察風潮中知識分子的活動——以嚴修的教育活動及其貢獻為中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46，臺北，2011.12，頁231-288。
- 周東怡，〈清末《奏定高等小學堂章程》與《奏定初等小學堂章程》的修訂〉，《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0，臺北，2018.12，頁79-118。
- 周東怡，〈清末教育法制化歷程的一個側面：預備立憲時期的簡易識字學塾〉，《法制史研究》，34，臺北，2018.12，頁141-175。
- 楊早，〈順天時報的崛起——1916~1917 北京輿論狀況〉，《佛山科學技術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4：5，佛山：2006.9，頁43-48。
- 鄭文惠、邱偉雲，〈從「概念」到「概念群」：《新民叢報》「國家」與「教育」觀念的互動與型塑〉，《東亞觀念史集刊》，10，臺北，2016.6，頁37-102。
- 劉愛君，〈20 世紀在華日本報人與中日關係——以《順天時報》為中心〉，《貴州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2，貴陽，2006.4，頁36-39。
- 韓承樺，〈複合式語言及難解的棋局：晚清時際的「群」／「群學」和「社會」／「社會學」〉，《東亞觀念史集刊》，13，臺北，2017.12，頁341-393。
- 關曉紅，《科舉停廢與近代中國社會（修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 土屋洋，〈清末の修身教科書と日本〉，收入並木賴壽、大里浩秋、砂山幸雄編，《近代中国・教科書と日本》，東京：研文出版，2010，頁286-328。
- 青山治世，〈『順天時報』とその社論・論説について——形態と執筆者の変遷を中心に——〉，收入青山治世、關智英編，村田雄二郎監修，《『順天時報』社論・論説目録》，東京：東洋文庫，2017，頁301-331。

四、網路資料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http://dl.ndl.go.jp/info:ndljp/pid/1907514>（2022/10/31）。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on Chinese Education Reform: As Seen through *The Shuntian Times*

Chou, Tong-yi*

Abstract

By examining *The Shuntian Times*, a Japanese-funded newspaper published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escribe Japanese public opinion on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First Sino-Japanese War (1894-5), Japan began sharing its own experiences in westernization with the Qing dynasty government, thus providing it with assistance in carrying out social refor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Japan helped China not onl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institutions, but,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with the creation of new ways of thinking.

In trying to determine how the Japanese public felt about China during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two main sources are available to us: diaries and reports written by Japanese scholars who had lived in China, and educational publications in China that were funded by Japan. As the former source has been well explored,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atter,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paid to *Lun-shuo*, a daily column in *The Shuntian Times*. The material is divided into six main categories: (i) general suggestions for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ii) descriptions of Japanese links with Confucianism; (iii) discussion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education; (iv) advice on abolishing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s; (v) women's education; and (vi) primary education reform.

Keywords: *Shuntian Times*, education, westernization, public opinion, China-Japan relations, late Qing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